

美国东亚政策中的双重建构——以奥巴马政府时期为例

【摘要】 鉴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权力领域东西方之间的此消彼长以及东亚地区秩序出现的一系列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东亚”自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之日起，便成为美国外交的首要议题。随着“重返”、“再平衡”等政策定位的确立，奥巴马政府在经贸领域以 TPP 为中心，在军事安全领域倚重地区传统盟友的同时拓展与东盟国家军事合作的规则化、网络化双重建构格局逐渐明晰。2017 年初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高举“美国第一”大旗，使得美国东亚政策领域面临着一系列变数，但不可否认，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确为美国应对外交决策环境变化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政策思路，而这其中的得与失也仍将作为未来美国东亚外交的决策起点与政策提示。

【关键字】 权力结构 地区秩序 规则化 网络化 不确定性

作者简介：丑则静，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研究方向：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国际秩序

教育背景：吉林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中央党校、伦敦大学学院（UCL）双硕士，中央党校、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培养外交学博士

一、变化着的美国外交决策环境

2009 年 1 月 20 日，面对现实的金融危机严峻局面与可能的“后美国世界”悲观论调，美国第 44 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上任后，奥巴马延续竞选中的“变革”口号，在内政领域停止减税、积极推动普及医疗保险；而在外交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将“东亚”置于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位置，为美国东亚政策重新定调。

“东亚”，主要包括东北亚的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南亚的东盟国家，同时延伸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过往美国政府在描述其地区政策时，为了建构其亚太地区领导力，彰显美国“太

平洋大国”的身份地位，往往使用“亚太”而很少单独用“东亚”进行定位。可早在冷战时代，美国就与数个东亚国家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势力深入东亚，具备了巨大的地区影响力。加之，目前的东亚，在政治领域，合作与冲突并存局势复杂；在经济领域，潜力与活力皆备前景广阔，使得美国外交政策虽冠名“亚太”，但政策对象多主要针对东亚地区国家。

外交战略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利益。国家外交就是一个试图通过运用实力资源去劝说别国让步以增进本国利益的过程。^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进入了一个全面转型的时期，在权力领域表现为，西方大国整体实力下降，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面对权力领域东西方之间的此消彼长，其核心国家利益莫过于防止其霸权地位的丧失以及避免地区性、全球性大国崛起对其霸权造成挑战。环顾世界，目前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地区和国家非东亚与中国莫属。美国战略界曾有人指出，美国的霸权焦虑缘起于中国加速崛起，美国认为中国加速崛起对美在东亚地区的霸权以至其全球霸权构成了直接挑战。^②可以说，正是因为外交决策环境的变化，才促使美国外交政策重心转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得以实现。

（一）美国权力之变

若长期关注美国问题，那么对“美国权力衰落”这一论断一定不陌生，因为美国人在担心自己国家衰落的问题上似乎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且伴有一定的周期性。早在18世纪，专注研究、比对罗马历史的美国立国先贤们，便开始担心起美利坚合众国的衰落。萨缪尔·亨廷顿曾总结过二战后美国探讨国家衰落问题的五个时间窗口：“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19世纪60年代后期尼克松总统宣布多极化之后；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扩张之后；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的财政和贸易赤字爆发之后”。^③虽然进入20世纪，美国崛起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论及“衰落”会时而涉及一国或多国作为对比参照，但在更多的时候，“美国权力衰落”描述的是一种心理感受，仅停留在学术领域。

但进入21世纪，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在美国国内关于美国

^① [美]约翰·罗尔克，宋伟译：《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②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 1, January 2008, p.23.

^③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US-Dilemma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Vol.67, No.9, Winter 1988, pp.95.

权力地位与未来世界秩序的探讨更为具体且针对性渐强，并出现“美国权力兴盛论”与“美国霸权衰弱论”两派观点争锋相对的局面。“美国权力兴盛论”以在冷战结束初期极力倡导“单极时刻”的学者查尔斯·克劳瑟默（Charles Krauthammer）为代表，他认为在“单极化”的世界结构中，由于美国与其他世界强国间巨大实力差的存在，美国霸权至少还将延续 30-40 年的时间。^①而“世界体系”理论大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与国际秩序领域知名学者约翰·伊肯伯里等学者却纷纷撰文，从不同角度阐述美国霸权存在衰弱迹象，对美国政策界与学界出现的“新帝国”设想表示担忧。“美国霸权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出现衰弱的迹象，‘9·11’事件则是使这种迹象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因素的作用下，‘美国治下的和平’已经结束”。^②几乎在同一时间，伊肯伯里也表达了由于受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影响，目前在美国国内以及世界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对美国大战略与其领导的单极世界的疑虑与反思，美国应警惕重新陷入“最古老帝国的陷阱”。^③

实力与机制是审视、评判国际秩序的两个基本视角，国际领域出现的国家间权力消长、国际机制制度的调整与重塑，都可以表明国际秩序正在经历转型与重塑。^④可以说，如果在“9·11”事件后，对“美国权力衰弱”这一问题还仅是停留在学术探讨层面，那么在经历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治领域内出现的一系列权力转移、机制重组都指向一个事实——美国霸权正在衰弱，美国对全球的领导力正在不断弱化。一方面，2008 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而“经济实力是美国霸权最核心、最稳定的根源”^⑤。金融危机使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进一步显现，美国制造业丧失了 110 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美国金融投资领域的霸主地位也受到挑战，国家引以为豪的经济软实力“华盛顿共识”同样饱受质疑。另一方面，“通过秩序建设实现其治下的和平”是美国霸权的主要特征，但现有国际机制，作为二战后美国版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改革与重组的压力。主要原因便在于，由于权力结构的变化，

^①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1, January 1991, p.23.

^②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 *Foreign Policy*, Vol.131, No.131, July/August 2002, p.60.

^③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81, No.5, September 2002, p.44.

^④ 蔡拓：“国际秩序的转型与重塑”，《外交评论》，2009 年，第 4 期，第 10-15 页。

^⑤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No.5, 2001.

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进入相互调和适应、合作竞争的磨合期^①；国际力量分布趋于均衡，新兴国家不再是国际决策的看客，开始在国际机制中争取更平等地位与更多的话语权。^②

而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政策界与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已经由探讨“美国霸权是否衰弱”转为分析“如何在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维系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008年上半年，面对深陷金融危机之中的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思考美国权力的未来，指出“相比一个世纪以前的因丧失经济驱动力而衰败的大英帝国，时下的美国仍然可以继续为世界经济提供动能与活力，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在政治领域存在的问题，美国仍将领导世界”。^③两年后，同样是在思考美国权力未来的过程中，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指导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概念——“巧实力”。奈首先陈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人类是在一个极不平衡的权力分配格局下开始 21 世纪的，在这一格局中占世界人口 5% 的美国，创造着占世界 25% 的经济产值、支配 50% 的军费开支，同时还享有着世界范围内最优质的文化、教育等软实力资源。^④基于此，奈进一步对“权力”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认为如果说美国权力衰弱，那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衰弱，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仍将保持对单一国家的权力优势；但美国也必须意识到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在解决全球、地区性事务的过程中，美国需要学会运用“巧实力”，更好地寻求来自其他国家的帮助。^⑤同样的，“运行在美国政府与学术路口”的美国智库，也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东亚、欧洲、中东等不同地区入手，传递美国霸权仍将持续，探究如何更充分、有效地发挥美国的全球领导力。^⑥

（二）东亚秩序之变

东亚地域广阔，战略资源丰富，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在冷战

^① 俞正樑：“试论中国外交新政的国际战略环境”，《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第1-9页。

^② 俞正樑：“论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基本特征”，《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6期，第1-8页。

^③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3, May 2008, p.18.

^④ 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6, November 2010, p.2.

^⑤ 同上。

^⑥ 参见 CFR 90th Anniversary Series on Renewing America: American Power and Profligacy, <http://www.cfr.org/business-and-foreign-policy/cfr-90th-anniversary-series-renewing-america-american-power-profligacy/p34919>（上网时间：2016年11月1日）；Fred Dews, “America Remains an Enduring, not a Declining, Power”, <http://www.brookings.edu/blog/brookings-now/2014/04/04/america-remains-an-enduring-not-a-declining-power/>.（上网时间：2016年11月1日）

时期，东亚地区长期受制于美国和苏联，美苏主导的双边与多边军事同盟成为地区事务的主导，地区秩序呈现两极对峙的基本特征。冷战结束后，计划经济模式衰弱、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全面传播^①，1989年在美国的推动下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正式起步，成为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地区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中国的不断发展崛起，不断改变着冷战结束后东亚经济、安全事务由美国主导的局面，而且这种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表现得愈发明显。

首先，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分工体系与经贸网络的中心，这一现象已得到美国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普遍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分析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形势时坦言，“如果没有中国提供增长和稳定的动力，世界经济形势恐将更加严峻”。^②具体到东亚地区情况更加如此，中国在2010年便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东亚地区第一大经济体；加上长久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同时也保持着对原材料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旺盛需求，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受益于中国的贸易伙伴关系。^③同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从单纯的市场驱动型向缔结区域性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的制度导向型转变，中国坐拥庞大的国内市场，并在推动双边、多边贸易协定上的积极作为，使得美日在东亚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渐有被中国取代之势。

而中国崛起将会对东亚乃至全球秩序产生何种影响，这一问题同样在美国国内引发广泛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后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金骏远（Avery Goldstein）与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曾分别撰文，集中阐述“如何与更富竞争性的中国打交道”。金骏远利用权力转移理论与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崛起，他分析到在权力转移理论的框架下，由于中国有可能对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中国的崛起是危险的；但按照制度主义理论的逻辑，基于中国有可能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合作，中国的崛起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遇。

^① Edward D. Mansfield &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3, July 1999, p.589.

^② IMF, Exter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Public Affairs, Webcast of the opening speech (March 18, 2012).

^③ Jeffrey A. Bader, "China's Role in East Asia: Now and the Future", <http://www.brookings.edu/on-the-record/chinas-role-in-east-asia-now-and-the-future/>.（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日）

①沈大伟则更直接得指出，世界没有哪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广泛的、多元的国内生态，美国国内讨论中国崛起可能给地区与世界带来何种影响，中国国内精英阶层同样在探讨未来中国究竟应扮演何种国际角色，但尽管如此金融危机过后的 2009 到 2010 年，无论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邻国还是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组织都感受到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与之打交道的必要性。②此外，《中国崛起：和平、权力、东亚秩序》、《争取秩序的斗争：冷战后东亚的霸权、层级与转型》等书籍也都一致性地肯定了中国崛起的事实，并从不同侧面讨论中国崛起是否会将挑战美国的全球与地区霸权。③

其次，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起来的轮辐式地区安全等级体系，依然赋予美国在东亚维持稳定的能力，也使美国在地区军事安全领域的影响力最大化。④可尽管在东亚存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式的安全合作，而且这一模式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护了东亚地区的和平状态，但仍难改地区安全体簇生这一特点，多元安全观念与利益相互交织，地区爆发结构性安全对抗与潜在冲突的可能性高。

应该看到，尽管在目前东亚尚未形成被地区国家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鉴于美国通过地区性双边及多边同盟体系为地区提供“安全”这一公共产品，而中国依托在地区经贸网络内的中心地位为地区提供“发展”这一公共产品的基本地区现实，美国所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的走向与中国综合国力崛起的未来，无疑将成为决定东亚地区秩序的两大核心因素。⑤不过很显然，这种复合型的东亚地区秩序并未完全展现中美两国的地区战略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碍美国地区战略利益与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实现。冷战结束后，美国依托其强大经济实力与在地区经营多年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导着东亚地区的经济、安全事务。但鉴于目前东亚经济领域所出现的不利于美国的权力消长与秩序变化，美国在地区经贸事务与一体化进程中的被排斥感愈发强烈，美国战略界

① Avery Goldstein, "Power Transitions, Institutions, and China's Rise in East Asia: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0, No.4-5, August 2007, p.639.

② David Shambaugh, "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4, No.1, February 2011, p.7.

③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Evelyn Goh, *The Struggle for Order: Hegemony, Hierarchy & Transition in Post-Cold War East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④ Dennis C. Blair and John T. Hanley Jr., "From Wheels to Webs: Reconstructing Asia-Pacific Security Agreements,"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4, No.1, 2010, pp.7-17.

⑤ 孙学峰、黄宇兴：《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趋势》，载孙学峰、刘若楠等著：《东亚安全秩序与中国周边政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4-111 页。

也曾据此指出，美国的霸权焦虑缘起于中国加速崛起，美国认为中国加速崛起对美在亚太的霸权以至其全球霸权构成了直接挑战。^①

为扭转这一局面，2009 年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不久，美国便全力主导推动“二十一世纪高标准、下一代”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TPP 谈判。在原有 P4 框架协议基础上，先后吸引澳大利亚、越南、墨西哥、日本等亚太地区国家参与，使得协议成员国的经济规模与贸易量分别占到世界总量的 40%和 1/3，成为二十余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贸易协议。^②在贸易协定内容上，涵盖商品贸易、服务投资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境标准、国有企业等方方面面，在全面勾勒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地区、全球经贸中的多元利益诉求的同时，也向地区与世界宣告美国有意愿更有能力继续主导未来世界的经贸格局。尽管由于 2016 年美国总统选战喧嚣、新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后宣布美国退出 TPP 等事件的作用下，美国重新布局东亚地区经济秩序的阶段性努力付之东流，但鉴于美国对中国在东亚地区崛起的天然防范，以及“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在 21 世纪将取决于其在亚洲的存在与参与”^③等共识性认定的存在，美国仍将长期作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域外力量。

二. 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的基本构成与主要特征

鉴于世界范围内权力结构向着有利于新兴国家的方向进行调整，以及东亚地区秩序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东亚从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天起，便成为美国外交战略中的首要议题。^④

2009 年初，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将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等东亚国家作为目的地，展开了其任内的第一次外访行程。同年 11 月，奥巴马也完成了其上任后对东亚的首次访问，访问过程中，奥巴马出席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成为历史上首位出席该峰会的美国总统，并在东京发表演讲全面阐述新一届

^①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1, January 2008.

^② 参见：USTR. Summary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http://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5/october/summary-trans-pacific-partnership>.

^③ Thomas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Remarks by Tom Donil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④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Honolulu, Hawaii, October 28,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10/150141htm>. (上网时间：2016 年 11 月 2 日)

美国政府的东亚政策，“美国对于引领世界摆脱经济危机的亚洲予以重视，将积极参与东亚事务”。此后，多位美国官员在不同场合反复重申，美国对于参与重构东亚秩序、继续保持在地区的经济战略领域领导地位的强烈兴趣。^①2011年，美国政府正式将东亚政策冠以“重返”之名，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称“‘重返’将作为美国外交的战略转折点，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战略投注将大幅度提升”。^②虽然在政策运行过程中，“重返亚太”逐渐被“亚太再平衡”所取代，但其政策实质并未发生变化，美国不断按照既定战略加强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安全存在，外交政策的重心调整终于基本完成。

（一）规则化的东亚经济政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以下简称 TPP），作为奥巴马政府时期最重要的贸易政策与东亚地区政策之一，与繁荣、安全、治理等美国国家利益紧密相关。^③TPP 的前身是 2005 年 5 月由文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等 4 国发起建立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由于协议创始成员国为四个，故又称为“P4”协议。随着美国在 2008 年开始与“P4”协议国接洽协商，2009 年正式在原有协议基础上提出 TPP，并开始全方位主导协议谈判，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国也相继加入，TPP 这一集中反映美国东亚外交政策布局、经贸领域利益诉求的“二十一世纪高标准、下一代”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已基本成型。经过 5 年多的艰苦谈判，2015 年 10 月 5 日 TPP 正式完成谈判，并于 2016 年 2 月正式签署协定文本。可以说，奥巴马政府从酝酿加入 TPP，到主导谈判过程中积极游说地区经济体加入，再到最终达成协议并力推本国和各成员国立法机构批注该协议的整个过程，集中展现了奥巴马政府东亚经济政策的构想、手段与最终目标等方方面面，其中规则化是最显著的特征。

第一阶段，宣布参与 TPP 谈判，展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贸政策意图。在 TPP 尚处于谈判阶段的 5 年时间里，外界对 TPP 协议内容的猜测多基于参与谈判官员的非正式表态、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发布的章节文本，以及最重要

^① Hillary Clinton,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Honolulu, Hawaii, January 12,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090.htm> (上网时间: 2016 年 11 月 2 日); Tom Donilon, “America Is Back in the Pacific and Will Uphold the Rule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7, 2011.

^②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Vol.189, No.189, November 2011, p.56.

^③ Mireya Soli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he Politics of Openness and Leadership in the Asia Pacific”,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the-politics-of-openness-and-leadership-in-the-asia-pacific-2/>. (上网时间: 2016 年 11 月 3 日)

的美国贸易代表处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网站所公布的 TPP 谈判进程与愿景规划。但这些不断释放出的协议内容,也从不同侧面勾勒着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地区、全球经贸中的多元利益诉求。例如,在商品贸易方面,涉及全面区域协议、货物市场准入以及原产地原则等方面,保护美国国内市场意图明显;在服务、投资贸易自由化方面,利用“透明度”和“公平性”等原则设卡,保护美国巨大的商业利益;同时也在协议中加入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国有企业等多个目前贸易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加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较完善的问题领域。

第二阶段,拉拢游说地区国家,扩大美国经贸政策在东亚的地区影响力。鉴于目前东亚地区渐趋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经贸网络,奥巴马政府在推动 TPP 谈判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在地区构建新的‘结构动力’,使 TPP 在地域以及经济规模上不断扩大”^①。一方面,从 2009 年加入 TPP 框架协议伊始,美国政府就通过各种手段极力争取日本的加入,改变 TPP 呈现出的“美国与众小国起舞”的局面。另一方面,截止 2013 年日本正式宣布加入谈判,TPP 各成员国已先后进行了 18 轮磋商,而这一谈判过程也使美国有充分的时间和论据向各成员国传递这样的信息,即美国有能力引领东亚构筑新的地区经济秩序。

第三阶段,积极推动协议签署,维护美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经贸规则制定领域的领导地位。2015 年 10 月 5 日 TPP 正式完成谈判,并于 2016 年 2 月正式签署协定文本。但这样一个成员国总人口占到全球总人口的 11%,经济总量与贸易总量分别达 40%和 1/3 的,二十多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贸易协议^②,却面临着来自 2016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狂轰滥炸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我现在反对 TPP,选举结束后反对,当了总统也会反对”的明确抵制,而有可能沦为美国大选两党对垒的牺牲品。在这种局面下,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仍然对在 11 月大选结束之后推动国会批准 TPP 保持着信心,美国贸易代表处首席代表弗罗曼也据此表示,“如果不能通过 TPP,将把通往全球化的钥匙双手奉给中国”^③。美

^① Hadi Soesastro, "Architectural Momentum in Asia and Pacific", *East Asia Forum*,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06/14/architectural-momentum-in-asia-and-the-pacific/#more-5132>. (上网时间: 2016 年 11 月 4 日)

^② 参见: USTR. Summary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http://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5/october/summary-trans-pacific-partnership>. (上网时间: 2016 年 11 月 4 日)

^③ 参见: USTR. Summary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https://ustr.gov/tpp/#strategic-importance> (上网时间: 2016 年 11 月 4 日)。

国学界普遍认为，WTO 框架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区域化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各国纷纷缔结一系列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协议，美国在这一背景下积极推动 TPP 谈判，本身就是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自由贸易协议树立美国标准、美国规则。^①而在 TPP 谈判进程中所引发的广泛讨论，以及 TPP 文本协议的最终达成，都表明美国有意愿继续主导未来世界的贸易格局，并有能力继续为世界提供更富进取心与时代特征的贸易协定蓝本。^②

（二）网络化的东亚军事安全政策

在美国外交已经高度依托国家军事力量的大背景下^③，无论是确立“重返亚太”的政策方向还是推行“亚太再平衡”外交战略，背后都离不开军事安全力量的积极配合^④。在奥巴马总统上任初期为摆脱来自阿富汗、伊拉克等国较为严重的战争拖累，不得不做出在未来十年削减 4870 亿美金国防经费的决定。尽管如此，2012 年 1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军事战略报告》，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的概念，基本明确由“9·11”事件之后的亚太、中东双战略重心转为亚太单战略重心。可以说，报告清晰表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将不会受军费开支缩减的影响，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安全部署将按照“更广泛分布、更灵活反应、更具政治持续性”的原则有序推进^⑤，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

首先，加强与地区盟友的军事合作，网状同盟体系已见雏形。奥巴马政府上任后的首份《国际安全战略报告》就突出强调美国在东亚所构筑的同盟体系的重要性，“我们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与泰国的同盟关系长期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基石与繁荣的保障。美国将继续加强与地区盟友的合作、拓宽双边关系领域，以更好地反映 21 世纪地区与世界的发展潮流。”^⑥2011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曾在著名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演讲中将“加强美国双边军事安全同盟”作为美国新一届政府东亚政策的六项关键任务之一。^⑦在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奥巴马政府更加注重构建同盟内部的协调机制，避免同盟国之间

^① Todd Allee and Andrew Lugg, “Who Wrote the Rules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Research & Politics*, Vol.3, No.3, July 2016, p.1.

^② Barnett M and Duvall R,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1, January 2005, p.39; Drezner D, “The Power and Peril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Complexity”,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Vol.7, No.1, March 2009, p.65.

^③ Karl W. Eikenberry, “The Militariza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 Vol.35, No.1, January 2013, p.1.

^④ Mark E. Manyin et al.,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28, 2012.

^⑤ Tom Donilon, “America Is Back in the Pacific and Will Uphold the Rule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7, 2011.

^⑥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⑦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Vol.189, No.189, November 2011, p.56.

各自为战，保障强大的同盟内聚力。

长期以来，美国都将日本作为维护地区安全、军事同盟体系的基石^①，奥巴马政府时期也不例外。例如，2014年4月，奥巴马在启程访日前接受《读卖新闻》书面专访，首次公开承认《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2014年7月，日本安倍内阁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美国政府立即给予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可以说，美国公开挺日的立场背后核心意图明显，即充分利用日本的战略资源，发挥美日同盟在地区安全中的基石作用。在搭建区域性安全同盟协调网络方面，过去八年间美国同盟体系的“多边同心圆”结构有向网状结构发展的趋势。在美国军方的策划与指挥下，以美韩“关键决断”、美日“利刃”、美菲“肩并肩”、美澳“联合突击”、“环太平洋”等联合军演为代表，计算机模拟、反潜、保护海上航道、海上联合指挥作战等具有实战意义的演习内容频频出现，极大地增加了同盟国之间的协同反应与联合作战能力。

其次，介入地区热点议题，参与东亚峰会机制，拓展美国地区军事交流合作网，提升军事威慑能力。在美国国内共识性的观点认为，东亚地区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长期经营对抗，是全球热点问题最为集中、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加之近年来得益于国民经济长期的两位数增长，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领导力。^②于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东亚军事安全政策出现了两大趋势：地缘影响力再平衡与地区军事实力再平衡，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美国积极与东盟国家展开有针对性、有指向性的军事交流合作，不断加强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能力建设。

以朝鲜核问题和南海问题等目前东亚安全领域最为棘手的两大问题为例，从2014年5月起，关于美国酝酿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及其进展的报道就频繁见诸美韩媒体；随后美国政府便通过多种途径就在韩国部署“萨德”一事进行持续性的协商；最终于2016年7月韩美军方在首尔发表联合声明称，为应对朝鲜核试和一系列导弹试射不断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韩美决定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萨德”系统，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反导安全网搭建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17 November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parliament>. (上网时间：2016年11月10日)

^② 参见 Thomas Fargo, “The Military Side of Strategic Rebalancing”, *Asia Policy*, Vol.14, No.1, July 2012, p.26; Mark E. Manyin et al.,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28, 2012

完成。而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的布局启动得更早，201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论坛外长会议上宣布，“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2011年11月，奥巴马成为第一个出席东亚峰会的美国总统，将东亚峰会的关注议题由经济逐渐转为政治与安全；在2012年6月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美国时任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表示，美军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地区部署多艘功能更强、技术更先进的海军舰艇，使太平洋与大西洋地区的军力部署维持在60/40的比例水平，并不断提升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军事交流合作。^①所有这些都使得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南海问题国际化倾向也日益显现。

三. 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的评估与展望

在美国普遍的观点认为，美国利益的实现与拓展关键在于其对世界范围内充满活力与繁荣地区的介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同欧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②但环顾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不同于中东的动荡与危机、欧洲的衰弱与质疑，东亚的“经济活力”与“总体稳定”举世瞩目。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速的地区，东亚地区的大型企业与科技创新在持续助力世界经济的同时，也吸引着数百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这也是为什么即使面对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与越战以来最困扰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泥沼，奥巴马也在上任伊始便坚定地将“东亚”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八年的时间里，美国的东亚政策以“重返”与“再平衡”进行定位，在经贸与军事安全领域同时推进，虽然在具体政策得失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同看法，但基本共识还是有的，即在世界权力结构与东亚地区秩序不断变化的大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对东亚的介入是强有力且富有成效的；目前美国已经成为决定地区走向的最重要变量。^③

首先，传递一个信息——“重返”。“美国过去是一个太平洋大国，现在及未来美国将持续保持这一国家身份定位。在未来的5年里，除美国外，50%的世界经济成长就来自于亚洲地区。但目前该地区安全领域存在的诸如海洋领土划界争议与朝鲜核威胁等问题，都将作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在风险。美国的领导地位对

^① “The US 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Leon Panetta”, Shangri-La Dialogue, The IISS Asia Security Summit, June 2012, <http://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1a%20dialogue/archive/sld2-43d9/first-plenary-session-2749/leon-panetta-d67b>. (上网时间：2016年11月11日)

^② Jeffrey Bader, “Obama’s Asia Policy: A Solid Double”,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6/09/15/obamas-asia-policy-a-solid-double/>. (上网时间：2016年11月11日)

^③ John B. Hurford Memorial Lecture: U.S. Strategy in Asia: Is the Pivot working? <http://www.cfr.org/asia-and-pacific/us-strategy-asia-pivot-working/p38368>. (上网时间：2016年11月10日)

于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促进地区商业与贸易的开放、透明，确保地区范围内对普世权利与自由的尊重意义重大。”^①这是 2015 年奥巴马任期内第二份也是最后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美国在东亚地位以及现行东亚政策的定位与评价。

虽然有人质疑奥巴马“第一位太平洋总统”的身份，认为理查德·尼克松曾在 1969 年做出过类似表态；也有人指出 TPP、加强美军在太平洋的军力部署等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并非全新的战略构想，它们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就已经启动。但透过“重返”、“再平衡”等一系列决策定位与“渐进性的政策创新”，美国向东亚地区国家清楚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东亚在过去 70 年的稳定与繁荣离不开美国的“保驾护航”，美国将重新或者说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存在，无论是在军事安全还是在经济贸易领域。^②

其次，取得一大成就——提升与东盟国家关系。自越南战争后，美国在东南亚外交明显缺乏政策指导与连续性。这一外交缺位现象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得到扭转，目前美国与东盟国家对话合作机制框架已基本成形，确保了美国对地区热点问题的持续介入。^③自 2009 年 7 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宣布“东南亚地区和东盟国家对于美国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始，美国不断通过现有的东亚峰会与新创立的美国——东盟峰会等机制密切与东盟国家的联系。

在经贸领域，东盟作为坐拥 6 亿 2500 万人口，年 GDP 达到 2 兆 4000 亿美元的经济体，每年与美国的贸易量也达到了 2600 亿美元；在军事安全领域，东盟成员国内不仅有美国传统盟友——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战略地位以及在南海问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④可以说，美国正是看到了东盟在左右地区形势方面的巨大潜力，在过去的 8 年间，积极参与解决东南亚地区事务，美国与东盟各国的国家关系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增进与改善，有效地平衡了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

第三，中美关系：一个未明确的定位。过去 8 年，从权力合作到权力再平衡，美国在东亚地区进行政策的重新整合、资源的重新部署。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华盛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② Kurt M. Campbell, *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 New York: Hachette Book Group, 2016.

^③ Mike Green, “The Legacy of Obama’s ‘Pivot’ to Asia”,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9/03/the-legacy-of-obamas-pivot-to-asia/>. (上网时间：2016 年 11 月 13 日)

^④ Robert A. Manning, “Does ASEAN Really Matter to America?”,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does-asean-really-matter-america-15203>. (上网时间：2016 年 11 月 16 日)

顿方面一再释放出消息，美国的“重返”与“再平衡”并非针对中国，但由于这一论断始终缺乏可信论据支撑，中美关系中的战略互疑在上升。^①

2013年，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就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从那时起中国便开始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思维、新眼光看待与谋划中美关系。但与中国不同，美国方面从2009年，奥巴马强调“尊重中国在亚洲的核心利益”，意图与中国实现权力合作；到2011年，变权力合作为权力再平衡，密切与地区盟友及东南亚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有意震慑中国；从2013年，宣布支持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再到2015年，因“过高估计中国在地区的军事实力”，不断介入地区热点问题，并在一过程中通过部署“萨德”搭建在东北亚的反导系统，通过加强在东南亚的军事能力建设巩固自身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领导权。可以说，奥巴马政府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及其在地区不断提升的影响力”问题上并未形成一致性判断，而这也使得8年间美国对华政策屡显反复，甚至存在矛盾冲突之处。

②

第四，TPP：一项未实现的“重大突破”。目前美国新任当选总统特朗普在通过视频阐述他上任100天的执政计划时表示，将会在上任第一天便发布总统行政令，退出TPP，这个“二十一世纪高标准、下一代”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取而代之以更“公正的双边贸易协定”。^③

“在数字经济时代，TPP协议所包含的众多规则为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农业等美国优势经济部门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东亚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的格局中，TPP将极大地增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也使众多地区盟友相信美国仍然有能力为东亚地区合作提供新的机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贸易谈判处于僵局之际，TPP通过拟定新的贸易与投资规则，填补在这一领域的治理缺位。”

^④TPP经过5年艰苦谈判，在这个过程中其经济价值、战略意义被美国多家智库、

^① Wei Ling, “Rebalancing or De-Balancing: U.S. Pivot and East Asian Ord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35, No.3, May 2013, p.148.

^② Jeffrey A. Bader, “Obama’s China and Asia Policy: A Solid Double”,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08/29/obamas-china-and-asia-policy-a-solid-double/>. (上网时间：2016年11月16日)

^③ Matthew Doran, “Donald Trump Vows to Withdraw from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ade Deal”, <http://www.abc.net.au/news/2016-11-22/trump-vows-to-withdraw-from-tpp-trade-deal/8045236>. (上网时间：2016年11月23日)

^④ Mireya Soli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he Politics of Openness and Leadership in the Asia Pacific”,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the-politics-of-openness-and-leadership-in-the->

研究机构反复论证，并基本取得共识。面对 2016 年 2 月才正式问世的 TPP 协定文本因遇到美国大选而胎死腹中，奥巴马政府东亚经济领域主要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加大了未来东亚地区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风险与贸易运行的不确定性。

四. 特朗普政府东亚政策的不确定性

带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赢得竞选，沿着“美国第一”的思路设计美国的内外政策，特朗普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就像其本人在就职演讲中所述，“美国的每一项贸易、税收、移民、外交决策都将是为了让美国工人、家庭受益……美国谋求与世界各国的友谊和良好关系，不谋求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任何人，但我们是本着这样的理解去做，即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①。具体到东亚地区政策，特朗普的解决思路与奥巴马大相径庭，甚至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东亚安全战略不仅是基于对全球问题的通盘考虑，还更多地建立在对奥巴马政府既有政策批判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看，当权力制衡遇到特朗普，东亚政策的不确定性随之上升。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先建国后制宪不同，美国发展出了一条“先立宪后建国”的国家发展之路。由参众两院组成的联邦国会、总统、最高法院和大法官，都是在 1787 年《联邦宪法》之后逐步建立的，美国自视建立起了全世界最为严密、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美国《联邦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虽然存在违宪监督、立法监督与行政决策监督等制约机制，但相较于国内政策而言，总统在处理对外关系过程中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加之美国目前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地位，其外交政策将会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巨大影响。^②

关于美国外交战略重心向东亚转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可以说得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界的一致认可。但由于特朗普“独特的世界观”，目前尚无法与共和党内

[asia-pacific-2/](#). (上网时间: 2016 年 11 月 17 日)

^① “Donald Trump’s Inaugural Speech, Annotated”,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1/20/us/politics/donald-trump-inauguration-speech-transcript.html>. (上网时间: 2017 年 2 月 17 日)

^② Daniel L. Byman, Dany Bahar, Sarah Yerkes, Pavel K. Baev, Dhruva Jaishankar, Richard C. Bush, Dan Arbell, David Dollar, Elizabeth Ferris, Ranj Alaaldin, Beverley Milton-Edwards, Federica Saini Fasanotti, Bruce Riedel, Robert L. McKenzie, Matteo Garavoglia, Natan Sachs, Kemal KiriSci, Ted Piccone, Philippe Le Corre, and Jessica Brandt, “Experts Weigh in: What this Election Mea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and Next Steps?”,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11/09/experts-weigh-in-what-this-election-means-for-u-s-foreign-policy-and-next-steps/>. (上网时间: 2016 年 11 月 22 日)

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团队寻找到共识点。他一方面认为有必要加大军事领域的投入重塑美国领导地位，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另一方面又反对美国在维持地区同盟体系过程中付出的过多成本，曾提出让日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特朗普对东亚地区的矛盾看法，加上他自身的攻击性性格很难于立法机构、政策顾问团队进行有效沟通协调，使得其东亚政策充满不确定性。

一方面，美国逐渐放弃在经贸领域对东亚的规则化引领，经贸保护主义色彩突出。出于对经济全球化可能加重美国国内失业问题的担忧，在 2016 年总统选战中，贸易议题就已经成为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突出关注的议题，而在这过程中特朗普明显“走得更远”，政策主张也更为激进极端。^①他曾多次在竞选集会、总统辩论等场合提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最糟糕的贸易协定，TPP 是一个坏的交易，会对墨西哥、中国分别加增 35%、45%的关税……而从就任伊始，特朗普也在不断兑现竞选承诺，宣布退出 TPP，与墨西哥、加拿大围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多轮次重新谈判，最终达成在特朗普看来符合所谓“公平、对等”，“让美国获益”贸易的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具体到东亚地区，TPP 作为奥巴马政府时期在东亚地区积极推动的最重要的经贸政策，美国多家智库研究机构都对协议给予高度评价，但其在特朗普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经贸格局中不具有继续推行的可能性。目前特朗普政府致力于打造“公正的双边贸易协定”进展缓慢，取而代之的是与中国等为代表的地区国家间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于打造东亚网状同盟体系以实现地区防务分摊再平衡的议题兴趣不高，部分地区盟国开始怀疑美国所提供安全保障的可信性与可靠性。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领域重要幕僚苏珊·赖斯曾撰文指出，“美国在东亚地区无以伦比的领导地位根植于同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泰国的同盟关系，过去的 8 年时间里，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同盟体系得到不断的巩固与加强，以更好地应对地区与全球性挑战”。^②但美国这一在东亚地区的政策基石，可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出现逆转。特朗普对盟友以及美国在东亚与欧洲地区构筑的同盟体系漠不关心，甚至伴有深深的敌意，他曾谈到“不认为在欧洲与亚太部署

^① Marcus Noland, Gary Clyde Hufbauer, Sherman Robinson, and Tyler Moran, “Assessing Trade Agendas in the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https://piee.com/publications/piee-briefings/assessing-trade-agendas-us-presidential-campaign>. (上网时间: 2016 年 11 月 10 日)

^② Susan E. Rice, “Overview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Congressional Digest*, Vol.95, No.7, September 2016, p.4.

军队会对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2017年9月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创10年来涨幅新高的、总额达692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使得特朗普政府扩充军队人数、打造更多军舰战斗机的计划得以实施，鉴于美国财政预算的总额限制，国防预算的增长必然意味着对盟友支持等非防务性支出的削减。这也是为什么，在特朗普政府东亚外交实践中更多采用向盟友推介美国先进武器，或直接要求其提高国防支出等手段，例如特朗普在国会演讲中就曾提到：“我们希望我们的伙伴，无论是北约、中东或太平洋国家，都可以介入直接有效的战略和军事行为中，并且付出它们应当承担的费用”。^①特朗普这种“美国优先”，带有浓厚权力政治色彩的东亚安全政策，使得部分地区盟国开始怀疑美国所提供安全保障的可信性与可靠性，而可信性降低被斯蒂芬·沃尔特认为联盟崩溃的主要原因。^②

五. 结论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进入了全面转型期，一方面在权力领域，西方大国整体实力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经济最具活力的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权力格局都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本文对美国国内出现的，在国际与地区两个层面的霸权焦虑进行了分析，认为正是这种焦虑充当了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重心转移的主要决策背景。

奥巴马政府在东亚推行“重返”、“再平衡”战略主要沿着经贸、军事安全两个方向构建。TPP作为奥巴马政府时期最核心的贸易政策，在谈判、游说、协商、推动本国和各国立法机构最终批准的整个过程中，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贸政策意图、制定地区与全球经贸规则的能力与领导力得到充分展现。同样的，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强与地区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搭建网状同盟体系；在介入朝鲜半岛、南海等地区热点问题的同时，拓展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影响力。

奥巴马政府用8年的时间向美国国内、东亚地区、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东亚对于美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同样的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离不开美国的领导。不过鉴于特朗普的外交战略理念却与奥巴马大相径庭，甚至有观点认为

^① Donald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in Joint Address to Congress,"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2/28/remarks-president-trump-joint-address-congress>.

^② 沃尔特曾指出“联盟的形成就是为了提高其成员的安全，任何对实现该目标能力的怀疑都会促使成员重新评估他们的立场”；参见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39, No.1, 1997, pp.160.

特朗普政府的东亚地区政策不仅是基于对全球问题的通盘考虑，还更多地建立在对奥巴马政府既有政策批判的基础之上，而这使美国的东亚政策面临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权力结构调整、东亚地区秩序转型等奥巴马上任初期面对的外交决策环境仍将考验特朗普政府，他将如何带领美国实现“稳固的同盟关系、高水平的经贸互动、与崛起中国的建设性关系、强有力的地区军事存在”等一系列美国政策界学界普遍认同的东亚政策目标，值得观察。